

2750/5

大 连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内部发行)

赠 阅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

陈经通 卓武强
本组编辑
孙郅玉 方

大 连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大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大连电业局印刷厂印刷

1986年1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字数: 95,000

印数: 1—3,000册 工本费: 1.20元

大连市文化局出字(内) №: 0005381

目 录

打开解放区对香港的通道·····	钱之光 刘 昂	(1)
深切怀念张志诚同志·····	鲁 民	(9)
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	祭阳冰	(15)
读《李汝航同志早年就是党的忠实朋友》的 感想和补充·····	李启文	(19)
石磊就义见闻·····	李佩武 宫涤生	(21)
庄河大刀会·····	鞠抗捷	(24)
庄河大刀会的土城子战斗·····	梁毓棠 王宝仁	(30)
俄日帝国主义统治时期的大连港·····	杜云孝	(33)
日寇统治下的大连殖民地金融业·····	孙耀庭	(40)
日寇统治大连时期推行鸦片专卖制度的始末·····	顾明义	(50)
日寇统治时期的大连西山会·····	安立宾	(56)
解放初期大连医务界的一些情况·····	郭文华	(72)
我的回忆·····	赵禁禁	(82)
一百二十五年前之大连点滴·····		
英侵华军随军译员罗拔特·孙霍记述 于明译		(92)
大连名称之来历····· (日) 井上谦三郎编 于明译		(101)
征集日寇统治大连四十年史料的参考题目(草稿)·····		
·····大连市政协文史办公室		(105)

打开解放区对香港的通道

钱之光 刘 昂

(一)

一九四六年秋至四七年春，我们在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及上海办事处工作。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依靠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彻底破坏了“双十协定”，撕毁了旧政协的一切决议，召开了伪国大，发动了全面内战。和谈陷于完全破裂，南京、上海办事处处于撤退前夕。周恩来同志已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回到延安，四七年初曾电示要我们去香港，拟以香港为基地，继续扩大对内对外的工作，加强香港与解放区的经济联系，以便得到必要的器材、药品、医疗器械等物资。我们购买好了三月初去香港的船票。但是，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办事处被国民党的宪警和特务包围，未能成行。三月七日，中共代表团南京、上海两个办事处的同志全部撤回延安。

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我们即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情况。他又一次提出，要我们到解放区沿海口岸工作，设法打通与香港的航道。于是我们编成一支小队伍，准备先到山东的烟台蹲下来，打通山东解放区与香港的海上通路。这时，中央确定董必武同志担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中央要我们俩与王华生同志一道陪同董老去晋冀鲁豫中央局所在地冶陶开会。会后，刘昂留在董老处工作，钱之光带着几个人赶赴烟台，同先前已去那里的同志一起，建立据点。然后派刘恕、鲁映夫妇，搭乘一只载重能力只有七十吨的小船，经由澳门到达香港，找到了我党一九三八年从武汉派杨琳在香港建立起来的“联和公司”，准备从经济工作开始，先搞点买卖，方便来往，从而有利于扩大活动面，开展工作和帮助解放区解决一些物资缺乏的困难。

一九四七年九月，烟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钱之光等同志辗转到

了大连。华东局财委驻大连办事处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朱毅、李竹平、王瑞庭等同志为我们天津街靠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座三层楼的房子，创办了中华贸易总公司。当时大连是苏军军管地区，各解放区到大连从事兵工生产、采购物资的单位，都是以各种公司、商行的面目出现的。我们在大连没有挂这个牌子，到大连市委备案，也没有用这类名称，只是用了个“钱之光同志处”，后来改称“刘昂同志处”，用“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名义，只是为应付意外情况的发生。

到了大连以后，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探索开辟大连到香港的海上通道。为保持与中央直接联系，我们还建立了电台。我们租用外国船只，往返于大连、朝鲜的罗津和香港之间，运出大豆、皮毛、猪鬃等土特产品，带回需要的物资。来大连采购战略物资的华东、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的同志，都与我们联系，由我们到香港办货。当时大连有个建新公司，下有化工、钢铁、机械等几个工厂，是一个以生产炮弹为主的兵工联合企业。负责原材料供应的经理部负责人谭伟经常与我们往来，通过我们到香港采购兵工生产所需要的重要物资。一九四七年前后，解放区正面临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对外交通几乎全被切断，大连成了对外联系的最重要的交通站。为支援前线作战，我们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满足各方面的需要。我们公司在香港也可算得上是贸易大户，只要我们的船一到，香港一些物资的价格就会受到波动。

除此之外，我们还通过这条海上航线，收集国民党方面的报纸、杂志，通过“交通”，送往中央，便于中央掌握、研究敌人的动向。有些南来北往的干部，也走这条路线。有一批到海南岛打游击的干部，就是通过我们，送往南方去的。这些工作，特别是电台的架设，大连至香港海路的沟通，为后来接送民主党派代表人物和著名进步人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创造了条件。

(二)

一九四八年五月，全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军在各个战场

上连连获胜，国民党统治已走向穷途末路。形势发展之快，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中共中央在“五一”节发布的口号中，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同时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党中央的号召，立即得到热烈的响应和赞成。

当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在五月五日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热烈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认为这是“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允符同人等之本旨”。他们并且同时发表通电，号召国内外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为了将这些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送往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中央曾设想开辟经欧洲到苏联，再转赴哈尔滨的路线，但未能打通。因此中央决定利用大连至香港这条海上航线，完成这一非常重要而又机密的工作。这样一来，接送民主人士的工作，就成了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

一九四八年六月，中央到达西柏坡，周恩来同志找刘昂谈话说：钱之光已经打通了大连至香港的通道，任务很重，人手不足，你去大连接替钱之光的工作，让钱之光去香港主持那边的工作。

刘昂离开西柏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对她说：中央派解放区妇女代表团出国，丁玲、张琴秋、吴青等人同你一道走，她们将与在北满的蔡畅同志会合后，赴匈牙利出席国际民主妇女第二次代表大会。于是，刘昂同她们一起出发，经山东益都（华东局所在地），到俚岛渡海北上。在穿过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时，突然遇上国民党的巡逻艇，探照灯在海面上来回搜索。华东局派来护送的同志当即关照说，请大家保持镇静，不要惊慌，并且要把不符合保密和容易暴露身份的东西扔掉。经过与敌人巧妙周旋，终于化险为夷，于第二天一早到达大连。出国参加会议的代表继续北上，刘昂则留在大连，

开始了新的工作。

(三)

钱之光向刘昂交待了在大连的工作后，向市委辞了行，于八月初从大连出发，经丹东抵朝鲜新义州，转乘火车到达平壤，会见了我驻朝鲜办事处负责人朱理治，办理了租用苏轮“波尔塔瓦”号货船的手续，开始了特殊使命的长途航行。

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周恩来同志指示钱之光，以解放区救济总署特派员的名义，前往香港。同行的还有祝华、徐德明和翻译陈兴华等同志。货船驶抵香港后，苏联驻港办事机构派人乘汽艇到船上来接。我们“联和公司”的同志也来访问接洽。钱之光当即与华南分局的方方、潘汉年同志等取得了联系，他们也接到中央关于接送民主人士北上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指示。大家都认为，这项任务艰巨，责任重大，需要很好地筹划。

当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很多，他们一直与我们党组织保持着联系。据我们所知，同他们保持联系的党组织有华南分局、香港工委，以及其他方面的一些同志。至于每一批安排哪些人走，什么时候开船，是根据民主人士的准备情况、货物的装运、香港的政治气候以及联系工作的情况等来决定的。

在复杂的香港，保守秘密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每次护送民主人士，特别是一些引人注目的知名人士上船，事先都需要作比较周密的安排。要求负责联系的同志机智灵活，特别要注意密探的跟踪。对于上船要经过的路线，事先也作了调查了解，约好从哪条路走，什么人去接，遇上情况如何应付等。为了旅途的安全，每次都有负责同志陪同，还派出有关同志随船护送。在“联和公司”工作的杨琳、袁超俊、刘恕、祝华、王华生、徐德明等，都参加了这方面的工作。

第一批接送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我们立即向党中央作了报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行动计划，并强调指出：这是第一批，要绝对秘密，保证安全，出发后有什么情况，要随时报告。八月下旬，沈老（钧儒）、

谭老（平山）、蔡廷锴、章伯钧先生等十几位，由章汉夫陪同，祝华、徐德明护送，于香港启程北上。八天以后，大连方面刘昂电告香港：“船已顺利到达朝鲜的罗津，中央派李富春同志专程迎接，已转往哈尔滨。”

（四）

第一批民主人士安全北上以后，刘昂又在大连租了苏联货轮，装上解放区出口物资和一些黄金到达香港。当时的任务，虽然主要是接送民主人士，但还是需要继续做经济贸易工作，一方面打掩护，同时也为在香港采购一些解放区急需的物资。因为当时“联和公司”的机构和办公地址已不能适应工作的开展，于是我们在皇后大道毕打街毕打行另租了几间大的写字间。钱之光认为：要重新取个名字，既要意义，又不能太暴露。经研究决定用“华润公司”这个名称。他解释说：“华是中华的华，代表中国；润是毛润之的润，代表我们的党。就是说，这个机构是我们党设的贸易公司。”大家都说这个名称好，于是便挂出了牌子，由杨琳任经理，以后中央决定由钱之光任董事长。

十月中旬，大连方面租的船到达香港，因与另一只船相撞而搁浅，需要就地检修，一时不能使用。可是已经商量好了下一批民主人士北上的行期，于是只好另租挂有挪威旗的轮船。这次走的有郭沫若、马叙伦、许广平母子、陈其尤、沙千里、宦乡、曹孟君、韩炼成、冯裕芳等人，由连贯陪同，胡绳随行，王华生随船护送。船在大连与丹东间的大东沟抛锚，东北局派了负责同志来迎接，韩老等改乘小船登岸，转赴哈尔滨。

（五）

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最多，加上我们党内的同志共有三十多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就是这一批北上的。对此，党中央极为关心。周恩来同志的电示也更加具体、周密。他事前给在大连的冯铿、刘昂的电报说：这一批民主人士北上，要与苏联驻大连的有关

部门交涉，租用他们的轮船，而且一定要在大连港靠岸，安排最好的旅馆，民主党派负责人要住单间，确保安全，要举行欢迎宴会，并请大连市委协助做好接待工作。就连宴会的席位座次，周恩来同志都有明确的指示。还说北方天气寒冷，要为他们准备好皮大衣、皮帽子、皮靴等。

周恩来同志在给大连电示以后，又给在香港的钱之光发电报说：已经走了两批人员，很可能引起外界的注意，这次行动要更加谨慎。经过慎重考虑，确定第三批民主人士走的时间在圣诞节后的第二天深夜。因为香港受西方的影响很大，每到圣诞节放假，人们欢度节日，这是行动的有利时机。

这一次北上的民主人士有李济深、茅盾夫妇、朱蕴山、章乃器、彭泽民、邓初民、柳亚子、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梅龚彬、孙起孟、吴茂荪、李民欣等。李嘉仁陪同，龚饮冰、卢绪章等随行，徐德明随船护送。

李济深先生是个很有影响的人士。我们与他有密切的联系，香港当局与他经常有往来，美国方面同他接触也频繁。这时，国民党已分崩离析，各种反动政治势力都想争取他，以此作为政治斗争的资本。白崇禧还曾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一位国民党桂系大员赶到香港，表面是邀请任公（李先生字任潮）到武汉“主持大计”，实际上是妄图拉住他，打他的旗号，图谋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李先生离港十多天后，白崇禧派的人才到达，听说李已走了，感到大失所望。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是第三批北上的民主人士上船日期。为了安全，要走的人事先都不知道与谁同船，各走各的路。有的从家里转到朋友家后上船，有的在旅馆开个房间，停留些时候再上船。民主人士不随身携带行李，看不出要出门旅行的迹象。到约定地点，由我们的同志护送上船。

一九四九年一月七日上午，轮船到达大连，中央派李富春、张闻天专程从哈尔滨来大连迎接，当时参加国际工运会议回到哈尔滨的朱学范也到大连迎接。大连市委的欧阳钦、韩光、李一氓等也到码头迎接。

民主人士下榻在大连最高级的大和旅馆（现大连宾馆），李富春、

张闻天还到各个房间看望。当天中午，又以丰盛的宴席举行了欢迎会。

根据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为了不使民主人士下船后受冻，我们想方设法在大连购到一批御寒的皮货。民主人士一到，我们的同志就送去了獭皮帽、皮靴、貉绒大衣。他们收到这些东西后，十分感动，有人还拿出钱来要付款。我们的同志解释说：“解放区实行供给制，衣、帽、鞋都是送给你们的。这是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办的。”他们听了，连声称道说：恩来先生想得真周到，吃、穿、住、行都给我们安排了，真是太感谢了。

在大连逗留期间，民主人士游览了市区，参观了工厂，然后乘专列经沈阳去哈尔滨。

第四批民主人士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日从香港出发的。有黄炎培先生夫妇，盛丕华先生和他的儿子盛康年，还有姚维钧、俞寰澄先生等人，他们由刘恕护送，在天津上岸，于三月二十五日到达北平，董必武、李维汉、齐燕铭等前往迎接。

原定新政协的筹备会议在哈尔滨召开，由于形势发展很快，一九四九年六月，改在北平召开。九月，召开了正式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选举产生了国家领导人。从此，新中国犹如初升的太阳，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六)

一九四九年四月，我们到了北平，准备在那里搞个地方，把大连的业务转移到北平去。就在我们筹建的时候，人民政府成立了对对外贸易机构，我们这个机构就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了。大连中华贸易总公司的干部，有不少分配到外贸部门工作。公司开辟对外贸易工作赚得的几千万美金交给了中央，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四九年五月初召我们去汇报这一阶段的工作，他高兴地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接送民主人士的任务和开辟对外经济贸易的工作，都是做得很好的。其实，这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自始

至终离不开党中央的领导，离不开周恩来同志的亲自指挥，有关地方党委也给了我们有力的支持。我们在大连工作的时间不算长，但却很有意义，至今不能忘怀。

（本文作者钱之光同志原任纺织工业部部长，刘昂同志原任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此文由市党史办葛玉广同志根据访问记录整理，并经刘昂同志亲自审订）

深切怀念张志诚同志

鲁 民

人事沧桑，往事如烟。在我走过的五十多年的生活道路上，经过风风雨雨，许多往事都已淡忘了，唯有张志诚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却难以忘怀。他的音容笑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至今历历在目，仍铭记心间。一转眼，志诚同志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八个年头了，每当忆及象他这样一位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终身，为开创和发展我市统一战线工作和政协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老同志，竟然在十年动乱中于一九六八年六月七日被迫害致死，怎不令人义愤填膺，潸然泪下！

张志诚同志生于一九零三年二月。原名严重，浙江省慈溪县人。少小丧母，随父去上海。父亲是前清秀才，民国初年曾在上海大买办严子君家坐馆。十岁丧父，家境清贫，不得不投靠亲友，靠他们接济生活，由外祖母抚养成人。志诚同志很早就受到同事、青年诗人、共产党员应修人的影响，并在他的启发、帮助和带领下参加了革命活动，积极组织“上海通讯图书馆”，团结进步青年，传播新文化思想。一九二五年发生“五卅”惨案，他出于强烈的民族义愤，参加了《五卅日报》的义务校对工作。他还在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听过沈雁冰同志主讲的“马列主义浅释”，接受了马列主义教育。同年六月经应修人介绍，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八月又在上海闸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六年因散发反对军阀孙传芳的传单，被反动当局逮捕。当时仅剩一张传单还未发出，由于他的机警应变，而且又有公开职业作掩护，这才被无罪释放。一九二七年在国民党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去武汉，参加了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秘书处工作。同年七月，因宁汉合流，国共分裂，他被分配到中共湖北省委秘书处工作。一九二七年底，湖北省委遭到破坏，他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九二八年春，党中央派罗亦农同志到武汉找到了志诚同志，并派他到上

海党中央机关递送文件。湖北省委重新建立后，他的主要任务是做秘密联络工作。由于党的基层组织不断遭到严重破坏，地下活动日益艰难，志诚同志也引起了敌人的注意，经组织决定，于一九二九年去上海党中央机关，在组织部担任书报发行科长，负责党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发行工作。到一九三一年秋，又派他去中央苏区，同行的有伍修权同志。到苏区后，担任江西省扬殷县县委书记；宁都暴动后，又到胜利县（均在宁都南部）任县委书记。国民党第三次“围剿”被粉碎后，一九三二年中央苏区扩大，苏区中央局进驻福建长汀，此时，志诚同志调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一直到一九三三年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苏区。他曾担任邓发同志领导的红军政治保卫局二科科长（当时谭震林同志是一科科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一九三四年十月，主力红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成立以项英同志为首的中央军区和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继续领导留在南方各根据地的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此时他是中央军区科长，直接在项英、陈毅同志领导下，参加了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对项、陈两位将军领导的游击队包围日紧，赣南苏区日蹙，敌人妄图消灭这支革命的队伍。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项、陈两位将军率队突围，撤退到赣南游击区，而志诚同志此时因患重病，未能跟上部队而被俘，并被解到信丰县。以后他历尽千辛万苦，才脱离了虎口，靠沿路乞讨流浪，来到广东南雄，住在一座小庙里。在白色恐怖的条件下，既不能公开打听党组织的下落，也不能公开自己身份，于是他只好一而千方百计设法寻找党组织，一而治病。晚上制作泥人、竹哨等小孩玩具，白天则沿街叫卖，借此赚几个钱来维持生活。直到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江西大庾池江圩义勇军办事处才找到了项英同志，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重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党的怀抱。志诚同志被分配到赣南地区担任特委秘书长。在特委书记杨尚奎同志赴延安参加“七大”北上后，他又接替了特委书记职务。一九四〇年第一次反共高潮后，赣南地区形势恶化，斗争十分激烈。志诚同志高度近视，身体情况又十

分不好，粤北省委决定把他留在南雄指导赣南的斗争。不久转移到曲江负责粤北省委秘书长工作。一九四一年，由于叛徒的出卖，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省委领导皆遭逮捕，只剩下志诚同志和宣传部长，他又一次同党失去了联系。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志诚同志根据党中央“疏散干部，保持力量，隐蔽斗争”的指示，冒着生命危险，把未落敌手的在曲江的同志安全转移。他还设法同狱中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掌握了一些情况，进一步部署了组织撤退和隐蔽工作，并鼓励狱中同志同敌人坚持斗争。一九四三年二月，志诚同志辗转找到了东江纵队，恢复了组织关系，并担任司令部无线电队政委，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组织决定他去香港治疗已经非常严重的肺病时为止。一位同他一起战斗过的同志回忆说：粤北省委遭敌人破坏后，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在十分险恶的条件下完成了组织上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的肺病已经相当严重，但他仍然坚持工作和学习。

一九四六年六月志诚同志随东江纵队撤至烟台，同年八月来大连疗养。病愈后担任大连市委副书记、旅大市委组织部副部长。一九五一年志诚同志受市委的委托，组建旅大市委统战部，并担任副部长、部长、市政协副主席、市委常委。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党内生活很不正常的情况下，他因所谓“多年来一贯右倾，在统战工作及党内重大原则斗争等一系列问题上，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犯了政治性、立场性、方向性的错误”而遭到“揭发和批判”，并被免去市委常委，一九六五年又被调离统战部到市人委视察室任副主任。

我从一九五二年调到市委统战部，直至一九五八年，都是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虽然 he 已离开我们，但他的风范犹存。他在品德和性格方面有许多突出的优点值得我们学习。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克服了长期左倾错误，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的今天，他的这些宝贵的品德和光荣的传统，更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扬。

志诚同志在统战工作中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的宽宏胸怀。他在市委领导下，在团结和动员各界爱国人士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动他们通过工作和实践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方面；在广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搞好党与非党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尽了最大的努力，为我市统战工作奠定了基础。他经常教育我们说：“我们共产党员有个组织部门来管，党员到了组织部门就象到了自己的家。我们统战部要成为党外干部、民主人士的组织部，到了我们这里，也应使他们象到了自己的家一样感到温暖，心里话都能向党讲。”志诚同志是这样教育干部的，他自己也是这样身体力行的。许多党外同志有话愿意找他谈，有事愿意同他商量，有了困难愿意找他帮助解决。他和许多党外同志交了知心朋友，互相串门，促膝谈心。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半点令人望而生畏的官僚作风，至今提起张志诚同志，大家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和眷恋。许多党外同志说，“张部长是我们政治上的老师，工作上的依靠，生活上的挚友”，他象“老妈妈一样，待人体贴入微，能诚恳热情地关心别人”。

志诚同志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从不人云亦云，敢于坚持真理。他对阶级斗争某些扩大化的做法，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一向遵照毛主席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方针，反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反对“无限上纲”。他在历次政治运动的风浪中，特别是面对“文化大革命”那种风霜刀剑相逼的严峻时刻，依然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从不见风使舵，察颜观色，阿谀奉承，投机取巧，而是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当他因历史上两次失掉组织关系而受到组织上的审查时，没有半点怨言；当他一九六一年被错误地扣上“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帽子而受到批判时，也仅报以忍受和缄默。总之，无论处在顺境还是逆境，他都不计较个人得失，总是兢兢业业，埋头工作，经受党的考验。

志诚同志是我们大连党内干部中党龄最长，过去又担任过较高领导职务的一位老干部。但他从不显露自己，从不向别人谈论自己的历史，从不居功骄傲摆老资格，不同别人比职务、待遇的高低。对组织上分配给他的各项工作，他都是无条件地、积极地去接受和完成。工作中出了差错，不管被认为是多么严重，他都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推诿和文过饰非，不使同志们蒙受半点委屈。他从不背后议论别人的长短，总是看别人的长处，那怕别人犯了错误，他也念念不忘他的长处；对

犯错误的干部，在不违背组织原则的情况下，他总是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九五八年有一位同志被错定为“反革命分子”，为了使他安心改造自己，志诚同志亲自劝说他爱人不要离婚，致使这一家人始终没有离散，直到这位同志的所谓“历史反革命分子”问题得到平反改正。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对不应划为“右派”或有所谓右派言论有而又真才实学、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他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志诚同志的组织观念很强，有时尽管在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但一旦形成决议，他就坚决执行。有一次市委讨论拟划一位同志为“右派分子”，志诚同志始终坚持不同意见，直至提出定这位同志为“右派”还不如定他自己。后来市委做出决定，志诚同志虽然提出保留意见，但还是认真执行的。在旅大党内斗争问题上，他认为“旅大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的提法是不准确的；对旅大地区的“落后地区改造”，他认为“错案不少”，“打击面过大”，从而支持了正确意见，维护了党的团结，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

志诚同志在生活上，始终保持着革命战争年代那种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同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不仅不向组织上要求特殊照顾，而且带病坚持工作，经常是上下班不坐小汽车。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组织上为了照顾他的身体，曾提出上下班派车接送，但都被他婉言谢绝，而和群众一样乘电车或公共汽车。在战争环境养成的勤俭节约的习惯，也一直保持着。他用的铅笔，只要手还能握住，就决不扔掉。他不仅拟稿多用用过的稿纸的背面写，就连日历和烟盒也不肯丢掉，用背而作便条用。有一年，市委行政处登记领导干部家里借用的公家家具，问他哪些是借用公家的时候，他说连我这个人都是党的，不用分公家和私人的，都一块登记上就是了。志诚同志为自己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有的同志说，张部长的一分钱都能握出水来，但他对别人的困难却慷慨解囊相助，急人之所急。有一位给他宿舍烧锅炉的工人同志，家庭生活十分困难，他一直在经济上周济他，并且还主动负担那位工人两个孩子的学费，直到中学毕业参加工作为止。志诚同志就是这样，在很长时间以来，把自己工资的大部分用来帮助有困难同志。他把替同志们排忧解难当成自己的义务，当成一件乐

事来做。

志诚同志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坎坷的一生。如果说他有弱点的话，那么就是他对许多事，包括别人对他的误解，甚至十年动乱时对他的诬陷和中伤，他都报以缄默和忍受，这似乎有点软弱。但他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和对待一些重大的原则问题，却一贯认真负责，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这又是他刚强的表现。可以告慰的是，党已经彻底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开始了新的历史时期；他曾为之奋斗而付出心血的我市统战、政协工作，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也像其它战线一样，日益兴旺发达；我市各界人士正满怀激情，为繁荣大连，振兴大连，奋勇前进！对这样的新形势，志诚同志亦当含笑九泉了。

（本文作者为大连市政协常委、中共大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